

澳大利亚研究丛书

A HISTORY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侯敏跃 /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澳关系史

澳大利亚研究丛书

中澳关系史

侯敏跃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澳关系史/侯敏跃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澳大利亚研究丛书)

ISBN 7-5600-1538-7

I. 中... II. 侯... III. 中国-国际关系史-澳大利亚 IV. D829.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19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澳关系史

侯敏跃 著

* * *

责任编辑: 蒋洪生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1)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市鑫鑫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0-1538-7/H·862

定 价: 11.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放在两极上,即第一世界的苏美和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研究前者主要是为了与之对抗;探讨后者是要建立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明确的政治目的也使研究本身偏重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方面,对文化、经济和贸易的探究则退居次要地位。

澳大利亚属于第二世界,当时与中国的关系又不密切,所以理所当然地落到了研究的聚焦点之外。出现的研究成果多属编译一类,停留于浅层次的概况介绍,且又零打碎敲,没有系统。研究力量分散单薄,难成气候。平民百姓对澳大利亚则更少关注。尽管就地理位置而言,澳洲比欧美更靠近中国,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遥远国度。

对澳大利亚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并由急剧的双向变化所引发。一方面中国敞开了经济开放的大门,派遣了经过精心挑选的学人,深入澳大利亚高等学府,苦心孤诣地钻研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全方位地对有关知识领域进行了科班式的修炼。这批学者回国之后,犹如当年取经回国的玄奘,纷纷建立研究中心,集结队伍,营造气氛,脚踏实地开始了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并有多种成果问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归属也作了重新调整,把目光从欧美移向亚洲,越来越多地介入亚洲事务,甚至公开声称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亚洲。

而中华大地经济勃发所透出的魅力,更吸引了曾一度观望的澳大利亚投资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融入中国的经济大潮,在工业、农业、科技和教育等方面与中国携手合作。澳大利亚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澳大利亚。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光知道袋鼠和悉尼歌剧院,不希望止步于“骑在羊背上的国家”那种原始印象。现实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尤其是把探究的领域从前期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扩展到对经济、贸易、科技和国家关系的审视,由务虚到务实,乃至虚实结合,使研究更为深入,也更具力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自1988年始每两年一次的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讨论会内容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的第一届会议上宣读的文学论文之多,使人误以为这是一次澳大利亚文学研讨会。两年后的第二届会议的侧重点仍是文学,自1992年的第三届会议起才开始显出各个领域研究的平衡态势。以研究的深度而言,首届会议上尚可见到称不上论文的肤浅的介绍性文章,到了后来,不但此类东西渐次销声匿迹,而且还出现了不少为中外学者所称道的见解独特、颇有深度的论文。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几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一方面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澳大利亚课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从事研究活动,举办了国内首次怀特作品讨论会、第三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讨论会、澳中经济国际讨论会和澳大利亚书籍出版国际会议。此外,还出版了《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文学论》、《澳大利亚文学选读》、《澳大利亚文化简论》、《澳大利亚历史》、《澳大利亚经济》、《当代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教育》等多部著作,撰写了有关论文五十余篇。现在我们又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澳大利亚研究丛书”,内中包括《澳大利亚政治》、《澳大利亚贸易》、《中澳关系史》、《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等著作。我们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的大力支持,正是这种热情与慷慨,使这样一些不易出版的著作虽历尽波折,最后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大澳研中心主任)

黄源深

1997年2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社会和中国移民	(1)
第一节 中国人移殖澳洲大陆	(1)
一、中澳最早的联系	(1)
二、中国劳工赴澳淘金	(7)
第二节 19 世纪澳洲排华浪潮	(10)
一、澳洲排华浪潮	(10)
二、华人移民的奋争和清政府外交上的无能为力	(22)
第二章 近现代中澳社会和双边关系	(30)
第一节 “白澳”政策下的华侨问题	(30)
一、“白澳”政策筑起重重障碍	(30)
二、华侨的自强不息和艰苦创业	(36)
三、中国设领护侨	(42)
第二节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中澳关系	(49)
一、中国的变迁和澳大利亚对华态度	(49)
二、澳洲华人对中国改良和革命运动的支持	(59)
三、中澳早期贸易往来	(65)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澳联系的发展	(74)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前的远东形势和中澳关系	(74)
一、“九·一八”事变对中澳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	(74)
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澳洲对华政策	(82)
三、中澳互派公使	(88)

四、旅澳华侨和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声援 与支持	(93)
第二节 中澳成为抗日盟友	(97)
一、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	(97)
二、关于治外法权的谈判	(102)
第三节 战后初期的两国关系	(105)
一、双边关系概况	(105)
二、奇夫利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成立的态 度	(112)
第四章 冷战时期中澳相互敌视和对抗	(119)
第一节 概述	(119)
第二节 远东的冷战和中澳相互敌视	(122)
一、中澳未能建交	(122)
二、朝鲜战争和中澳敌视的开始	(126)
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澳洲参与对华遏制	(133)
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时期澳洲政府的态度	(139)
五、印尼因素对中澳关系的影响	(142)
第三节 越南战争时期中澳关系的恶化	(146)
一、中澳对战争的不同认识和对策	(146)
二、中澳关系的恶化	(148)
三、澳台关系的提升	(153)
第四节 贸易和互访	(157)
一、澳大利亚对华贸易政策	(157)
二、有一定发展的双边贸易	(163)
三、时断时续的互访	(167)
第五章 中澳邦交正常化	(173)

第一节 中澳和解的大势所趋	(173)
一、两国和解的有利条件	(173)
二、澳洲政府的对策和态度	(177)
三、缓慢的和解	(181)
四、民间外交的发展	(186)
第二节 中澳建交	(189)
一、工党在野时期对华政策演变	(189)
二、惠特拉姆访华	(191)
三、中澳建交	(193)
第六章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概述	(197)
第一节 惠特拉姆时期两国共筑友好合作新关系的基础	(197)
一、中澳外交战略的异同	(197)
二、交往与了解的增加	(201)
三、双向贸易的初步发展	(206)
第二节 弗雷泽时期双边关系的发展	(210)
一、弗雷泽外交思想和他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210)
二、反霸斗争中两国相互支持	(215)
三、经济合作的多样化	(221)
四、双向交流日趋频繁	(227)
第三节 友好合作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230)
一、共同关心和维护亚太和平和稳定	(230)
二、友谊关系的迅速发展	(237)
三、发展互相补充的经济关系	(241)
第四节 中国人赴澳留学的浪潮	(247)
一、留学澳洲潮起潮落	(247)
二、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249)

三、留学生的居留问题	(251)
第五节 1989 年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概况	(255)
一、波折	(255)
二、友好合作关系的正常发展	(260)

第一章 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 社会和中国移民

第一节 中国人移殖澳洲大陆

一、中澳最早的联系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源远流长,传说早在古代,中国人就发现了澳洲。14至15世纪明朝时期,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明朝皇帝经常派人远航。1405年到1433年,郑和奉命7次远出航海,旨在打开中国到南洋、印度和非洲的通道,同邻国建立友好关系。那时,就南洋而言,中国人已经有能力抵达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爪哇、巴厘、帝汶等岛屿。据说郑和的船只曾从帝汶岛南下,驶抵澳洲西北部。但至今尚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难以定论。

1879年,华人劳工在今天的达尔文港附近挖掘到一尊寿老神像,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28年开始,有人对其来历及意义予以研究,比较公认的可能性有三种:第一,神像是唐朝时的工艺品,由某种玉雕刻而成,也许在那时被带入澳洲;第二,可能是郑和船队抵达澳洲西北角后留下的;第三,19世纪赴澳的华人移民偶尔失落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埋于土壤之中。但最近有材料说,这尊神像是由一种便宜且较为柔软的皂石制作的,它不可能有很长的历史,极有可能是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劳工丢失或者掩埋的。孰是孰非,尚难确定。看来神像被发现的最大意义是到底谁

先发现的澳洲，华人最早于何时抵达澳洲等问题。

本世纪30年代，中国少数学者也开始就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据曾出任驻澳领事的刘元亨介绍，17世纪30年代时，一艘名叫“箕帚”的中国船在航行中因受风暴吹打而靠近澳洲，踏上澳洲土地的人除一人侥幸逃脱外，都被当地土人杀食。^① 消息传开后，华人入澳探险者日渐增多，当时他们的居留地限于北澳及昆士兰等地。又据另一位中国学者说，“明末大将黄德滋率兵船南败之后，曾到澳洲北岸士维港驻扎”，另外，“西历1751年，中国船员由爪哇之巴达维亚出发，到澳洲海岸采取海产。”^② 明清时期，中国已和苏门答腊、爪哇及附近岛屿进行贸易，当地海参和极乐鸟在中国可卖高价。1948年，在卡奔塔利亚湾的温切尔西岛上发现了中国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早期制造的一件瓷器碎片，由此推断中国海员可能那时到澳北岸捕捞过海参。

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去证实上述中国与澳洲最早发生的联系。然而，中国移民很早就对位于澳西北面的众多岛屿进行过开发，那里距澳洲大陆并不遥远，他们继续往南探险或移殖，在技术和物质上并不存在多大的困难。而且从当时兴盛的寻宝发财这一世界潮流来看，也存在着促使华人进一步南下的巨大诱惑。但是，昔日的澳洲为未开化的土人盘据，荒芜不毛，从未开发，以至第一位见到澳洲大陆的欧洲人——荷兰船长威廉·杨茨——于1606年到达约克角半岛的西部海岸时，不无叹息地说：“那里没有什么有益的事可做。”以后一百多年里，发现澳洲的西方人都认为此地无用而离去，未予计划性开垦。1788年，英国向澳洲移殖人口进行开发，也仅限于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植物湾附近

① 《东方杂志》，第28卷第13号（1931年7月发行），第70页。

② 《新中华》杂志，第4卷第17期（1936年9月号），第35页。

(今悉尼一带)。自然,即使 17 世纪或者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到过澳洲北部,等待他们的不是死亡,就是被迫离开。满清政府对移居海外的华人是歧视的,移民回国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们只得祖辈漂泊在外,自生自灭。关于中国人首次与澳洲相通的事例就很难在中国的史籍中记载下来,而只是在海外华民中流传,以至到今天,中澳关系史上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有记载可查的澳洲第一次与中国相通,发生在英国往澳殖民之初。178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 3 艘船自澳洲植物湾开往广州。正是在那年,英国海军上校阿瑟·菲利普率领的船队在现今悉尼附近登陆,开辟了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历史。但在最初几十年里,英国不过把这块新大陆当作拘押犯人的新场所而已,殖民地人口以罪犯为主。当时英国法律严酷,澳洲荒地连绵,毒蛇猛兽频繁出没,英国人又缺乏足够的生产工具和开垦经验,因此,他们的开荒长期内进展不大。那时,华侨在新加坡、爪哇等地的垦殖,早已取得了公认的实绩,有些人逐渐开始向澳洲这个新天地迁移。“据《亚洲殖民地》所载,华侨在 1823 年到 1825 年之时,结队到澳洲从事开垦。”可见,华人最早不是从中国大陆而是从南洋到澳洲大陆的。自 19 世纪起,他们开始以一定的规模前往澳洲。

进入 19 世纪 20 年代,澳洲殖民地经济步入畜牧业大发展时期,1850—1852 年澳已拥有 1 600 万头绵羊。羊毛出口 1810 年仅 167 磅,1821 年升到 175 000 磅,1830 年达 200 万磅,1850 年更猛增至 4 000 万磅,占英国羊毛进口总量的一半。同时期,种植业也有所发展,耕地面积渐渐扩大,粮食产量增加,殖民区开始拥有余粮。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更多的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流放的罪犯自然成为最先雇佣的对象。早在 1789 年,澳就允许指派罪犯为私人(自由民)雇主工作,1804 年,指派工作成为一种制度。19 世纪 20 年代前,从事指派工作的罪犯并不多,然而到 1838 年,新南威

尔士的 38 000 名罪犯中,有 26 000 名为私人工作;1835 年,凡·第门(塔斯马尼亚)的 17 000 名犯人中,有 12 000 名被指派了工作。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澳民族主义开始抬头,自由移民反对英国继续把殖民区当作罪犯流放地,从英国放逐到澳洲的犯人逐渐减少。1840 年,基本上停止了流放罪犯。在 19 世纪 20 年代,殖民当局对来澳洲的自由移民,一律无偿分给土地。随着生产的发展、罪犯的减少和自由民无偿获得土地的增加,导致有钱人难以找到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无从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去的资本不能发挥作用。他们因而考虑从亚洲、太平洋岛屿输入劳工。起先,有人提议使用印度苦力,由于印度、英国以及澳殖民地有关委员会的反对,这次计划流产。于是,中国苦力大规模飘洋过海以及他们在开荒上取得的成绩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使澳土地所有者和牧场主想到了招募中国劳工。

输入中国苦力开发澳大利亚,最早是英国人詹姆士·马特拉在 1783 年倡议的,威克菲尔在 1829 年也提出了这个主张。这一次,殖民地有产者首先尝试从南洋招募华工。1837 年 6 月 19 日《悉尼先驱报》登载了一则从新加坡引进中国劳工的广告,广告人戴维森称,计划招雇 400 到 500 名中国人到悉尼做苦力。1838 年,新南威尔士的马凯受借地人的委托,用私人出资方式想输入几百个中国苦力。但这两次招工未见结果。澳从中国大陆直接输入劳工,是 1848 年的事。这年 10 月,由詹姆士·塔特在厦门买得的成年人 100 名、童子 20 人,乘船抵达新南威尔士殖民区,开启了华人移民从中国直接进入澳大利亚各地的大门。当时,赴澳洲的华工主要来自厦门、香港、新加坡三个地方,开垦澳洲西部的华工,则完全由新加坡而来。

华工刻苦耐劳,劳动力价格又极其便宜,深受当地买主的欢迎,贩卖苦力到澳洲的生意开始兴旺起来。苦力贩子鼓起如簧巧

舌诱骗华人同胞到海外发财，华工一旦踏上他们的船便无法逃脱。根据英国代理厦门领事白克好司的记载，1848至1852年光从厦门去悉尼的华人就达2 638名。其中1 438人是1851年运出的。这时期主要是契约的劳工，这些契约苦力到澳后遭受到层层盘剥。由于他们的路费由贩子垫付了，他们先得无偿工作约三年，作为赎身之价。他们的工作异常繁重，主要从事收羊、码头工、厨师等，生活极端困苦，所给食物是最劣等的，所住的房屋是最简陋破旧的。澳洲的现实状况，使他们如梦初醒，他们思恋故乡，却不能回归。有的华工只得在树上刻上感伤的诗句，来寄托他们的哀思与悔恨，有一首诗说：“沦身绝域古澳洲，到处荒凉满目秋。峰恩未开罗网设，捶胸惟恨足轻投。流落蛮邦不自由，囊空如洗向谁求。故乡有路难回首，异地无亲莫妄投。”^①

华工在澳的状况令人悲感，他们在去澳的旅途中同样受到非人的虐待。当时，从香港乘船往澳东部的悉尼、墨尔本或者南澳大利亚需要60到80天，去西澳要45至60天。由于招工组织和船长贪图赢利，轮船常常超额超载，舱内塞满了贫穷的劳工，空气窒息，对华工施以鞭打是家常便饭的事。船上卫生条件恶劣，痢疾流行，配备的随船医生常是不合格或不负责的，有些船根本就没有医生，路上经常有人死亡。沉船事故也威胁着船上人员的生命安全。1853年，一艘载有445名华工驶往澳洲的船，路途死亡13人；第二年，一艘三桅船，在从香港驶往澳的途中，在苏禄海峡触礁沉没。苛待与暴虐引起的华工海上抗暴时有发生。1852年1月，英籍船“斯巴顿”号装载254名苦力，从厦门启航开往悉尼，船开出不到几天，苦力暴动，他们重伤了船长马歇尔和多名水手，许多苦力则因此丧命；1854年，一艘从香港开往澳洲的轮船，中途触礁漏水，开

^① 《新中华》杂志，第4卷第17期（1936年9月号），第36页。

到新加坡，华人趁机冲出船舱，四散逃走。

苦力移民到澳大利亚，弥补了殖民地劳动力的短缺，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澳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一定数量的存在以及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价值，给当地带来了一些影响。其一，白人自由民担心因竞争不过苦力，影响他们发财致富；其二，苦力所受的奴隶般的待遇，有悖于白人在澳大利亚建设没有奴隶剥削的社会的愿望；其三，澳洲人歧视华人，认为他们会把疾病和恶习带入澳大利亚，有碍于社会发展，因而华人苦力的进一步发展，可能造成种族纠纷，给澳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有鉴于此，在白人移民中，“引进有色人种劳力的任何建议都将遭到强烈反对”。这种态度无疑对殖民当局的移民政策产生了影响，自1852年起招募赴澳契约华工开始降温。当然这其中部分原因也是由于金矿的发现，中国移民在赎单客运制度下，涌入各金矿区，已经在澳的契约苦力也不愿再替雇主工作，中国人移居澳洲进入了新的阶段。

自19世纪初中国人从南洋自发地去澳洲至1853年，是华人移居澳洲的第一阶段，在此之前，由于未见明确记载，难以断定是否有个别华人到过澳洲大陆。根据有关材料统计，这五十多年中从各地去澳洲的华人劳工约有一万二千五百名。但是，澳当地人口统计揭示，华人数目不多，如1850年，澳人口总数为405 356人，其中亚裔人不超过3 000，以华人占其中半数估计，最多是15 000人。可见华人回国的比例是很大的，他们并未把澳洲当作永久居留地。

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到1852年，为本时期内华人赴澳的高潮期，因为那时正值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打破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迫使清政府开放东南沿海的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和广州5个通商口岸，大大开辟了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门径。客观上，也为开辟各地与海外联系创造了方便，带来了一股推动力。同时，澳洲殖民

区以牧羊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并形成蓬勃之势，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罪犯流放却基本停止。这样，在资本主义向东方大举侵略征战的冲击下，年轻的澳大利亚和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以苦力移民为纽带的联系和撞击，揭开了中澳关系的第一幕。

二、中国劳工赴澳淘金

19 世纪 50 年代在澳洲掀起的淘金热给澳洲的历史发展带来巨大推动，而采金的狂热引起了华人赴澳采掘黄金的浪潮，结果使在澳华人数猛增，形成了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使华侨问题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中澳关系的主要内容。

1851 年，澳大利亚东部发现黄金的消息不胫而走，怀着发财致富美梦的欧洲人首先如潮水般涌向澳洲。此时，由于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的加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走向解体，洋布、洋纱等外国机器产品逐步排斥中国手工劳动产品，以前从事家庭手工业和纺织业的中国普通农民遇到了失业的危机；洋货对华输入的增加和鸦片走私贸易的扩大，使中国白银外流较鸦片战争前更为严重，导致银两愈贵，铜钱愈贱，《南京条约》规定的中国的赔款负担又完全推到了广大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受到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生活极端困苦。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促使各阶层寻找自救和救国的道路。

1852 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发现黄金的消息，经航运公司和商人传布到我国南方，中国移民开始瞄准新的黄金产地，陆续前往。但这次移民却主要来自广州周围的 13 个县，从其它县或者厦门去的为数不多。1854 年，形成了高潮，澳洲华人急剧增加。这年头 3 个月，前往墨尔本的华人就达两千人以上；1854 年，维多利亚殖民区第一次人口调查时华人只有 2 341 名，1855 年年中上